

事件观

基层办公室岂是随意开关的商铺

陈倩儿

在国庆长假到来前两周,四川省达州市的几位社区干部就提前“放假”了。根据媒体报道,为了躲避国庆出行高峰,7位社区干部一起向分管他们的街道办事处请了个假。以“学习附带休假”的名义,他们带上家属亲眷,集体到西北地区游玩了11天。至于他们负责的团包梁便民服务站,则像是个暂停营业的商铺:大门依旧敞开,但所有工作人员却统统消失不见,连办公的电脑也用一块红布盖了起来。几位社区干部的想法,乍听上去也是人之常情。毕竟,黄金周一锅粥,早已是国人的共识。避开汹涌的人流,在绝大多数人还未出行之前抢夺先机,享受一个高质量的悠长假期,这是很多人的心愿——干部们也不能免俗。团包梁社区的书记后来也解释说,在平日的工作里,社区干部已经“比较辛苦”了,让他们好好放个假,是体贴人情。工作的事情,他们完全可以在“十一”长假期间再值班补上。这解释,似乎合情,却并不合理。应该承认,干部们并非“特殊材料”制成。在涉及衣食住行的问题上,他们的内心与老百姓一样,怀着各种各样蠢蠢欲动的私欲。这些欲望的触角可向金钱、名、美色,或者,仅仅是一个让自己彻底放松的长假。可对于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面对这样的欲望,是不是应当比普通入多一分自我克制?私欲的情境之外,公职人员承担着公共性的社会角色——他们拿着来自纳税人的俸禄,有义务为纳税人服务。循着这一逻辑,坐于公职之位的人理应克制自己漫无边际的私欲。这种克制可以不出于纯粹的清高志向或个人的崇高追求,但必须基于一条底线:公职人员欲望的每一个触角,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伤及纳税人的利益。转型社会,尤其需要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权力的敬畏。可惜,在过去的很多新闻里,我们很难体察到这种敬畏的痕迹。去年9月,温州市一个村委大楼同样在工作日里大门紧闭,一旁的电子屏幕上滚动的公告写着:“村两委感到压力很大,决定暂停上班。”据说,这“压力”的来源,只有村民怀疑他们私吞了几千张“嘉年华”门票。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干部更像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们无视规则与责任,一切都随着自己的性子来。而他们所在的行政部门,似乎也变成了自己做主的私人商铺,要开门营业,还是关门休息,一切全由自己说了算。那么,他们本应服务的纳税人呢?当7位社区干部逍遥西北的同时,只有两位来自附近社区的老人被安排看守着便民服务站。对前来办事的居民,他们的回复只有一个——“等领导回来”。所有办理档案转移、党组织关系的居民统统在便民服务站里碰了钉子。在这般“领导”眼中,纳税人等候他们,还就他们的时间安排和心情变化,似乎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某些公职人员平日里坐在办公室里,是用怎样的态度面对市民。他们是不是也会因为“压力很大”而拒绝接见市民、提供服务?会不会因为没有时间而将市民随意打发回家?我们难以想象,这样“随意”的土壤最终还会滋生怎样的乱象。就在上个月,湖南省凤凰县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一个工商所突然之间停止办理业务一整天,而原因,不过是“干部职工家中办喜事”。这滑稽场面的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一套值得警惕的逻辑:基层办公室成了商铺,干部成了小老板,在这样的情境中,因权力而生的更严重的贪腐,实有可能。

工业退后,艺术向前
9月17日,首钢石景山厂区,几个储气罐被改造成光影艺术作品。当日,2012“闪耀北京”光影文化节在首钢石景山厂区开幕。 CFP供图



本报记者 林衍

28年后,曾经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起点”的浙江莫干山,迎来了一场新的会议。9月18日这一天,在一家饭店的3层会议室里,背景屏幕上不断闪烁着“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字眼,坐在台下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们安静地望着并排坐在主席台上的几位前辈。他们包括曾经提出“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华生、最早发布“灰色收入”研究的王小鲁,以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贾康。这是他们在这里的第二次相聚。1984年,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步履维艰。在当年9月举行的莫干山会议上,形成了包括《价格改革的两思路》在内的7个研究报告,其中,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标志着中国正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当年参会的很多年轻人,日后都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其中包括如今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是当时的论文组组长,另一位经济学家张维迎,当时则是岁数最小的参会者。曾经论文组组长的王小鲁如今已经满头白发。他形容当年的会议“就像汽车上山开不动了总要有谁来推车一样”。“谁推了第一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去推了一把。”在28年后的第二次莫干山会议上,面对着台下比他小20岁甚至30岁的年轻人,他缓缓地说:“第一次莫干山会议到现在也有28年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革而没有改革、需要推进而没有推进的地方。这些地方需要改革,也需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再来讨论改革。我们还需要有一大批人推车。”

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让莫干山会议重启改革议题的关键人物是曹文炼。这位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1984年时刚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便进入了国务院物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过莫干山会议的全套原始资料和当时中央领导对于这个会议的批示。“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多年来的一个情结。”今年3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曹文炼结识了莫干山管理局的王惠良。闲谈中,两个人“碰”出了举办第二次莫干山会议的想法。“坦率跟大家说,我跟很多上级领导口头汇报过,没有任何领导说这次会议不能开。”在现场,曹文炼将二次莫干山会议的到来去脉和盘托出,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 第一次莫干山会议到现在也有28年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革而没有改革、需要推进而没有推进的地方。
5天的会期里,28年后重聚在莫干山的老朋友在讨论中“针尖对麦芒”,青年学者直接反驳前辈的论述。
很多人在新时期的会议中,怀念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革年代”。

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而在最终上山的119名参会者中,绝大多数成员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其中甚至不乏一些在第一次莫干山会议时还没有出生的年轻人。对于出生于1987年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郭晗来说,对于莫干山的印象只停留在他的77级校友张维迎身上,来自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李清斌比郭晗大两岁,他的记忆里,与莫干山有关的故事曾经出现在老师们所讲述的80年代改革史中。“很多人跟我说80年代挺精彩的,比现在精彩多了。”刚刚毕业不久的李清斌腼腆的笑着说。在第一天的组别代表发言里,宏观经济组的一位年轻学者率先发言:“如今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老百姓都到河对岸去了,而利益集团却在深水区里不愿意动。”不过,客串主持人的华生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表述。“现在的麻烦是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利益集团,而自己不是。”他抱着胳膊,微笑着说,“我的问题是,你们所说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显然,发言者并没有预料到华生会把他的话展开“追问”。“嗯,反正我们不是利益集团,所以不知道真正的利益集团在哪。”他的回答略带局促。“搞了半天,你说改革是因为利益集团的掣肘,但不知道利益集团是谁,这不行吧。”华生将目光投向了台下。“他讲的这个我也不能接受。”作为为数不多的媒体代表,共识网的主编周志兴接过话筒,直率地说,“我觉得所谓的利益集团就是有权力推动改革或者阻碍改革的集团,在座的我们自己算一下吧,我有权力推动改革吗?我有权力阻碍改革吗?如果有,那我们就利益集团。”这并不是李清斌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在她的印象中,这类会议的全部内容就是专家发言,甚至通常连提问的环节都没有。就在参会前,他甚至特意准备好了纸和笔,打算做做记录就算了。他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连28年后重聚在莫干山的老朋友都要“针尖对麦芒”。

以自由争鸣作为大会的主基调 相比于博鳌论坛与达沃斯论坛,谁还会来莫干山呢

事实上,1984年莫干山会议最被人们津津乐道之处便是其新鲜的会风。当时组

一个心照不宣的主题。第一次演讲,华生就惟妙惟肖地模仿起当年张劲夫如何将手背在身后在屋里踱步的样子,当时,这位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亲自听取了眼前这位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所作的关于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汇报。同样以往事作为演讲开端的嘉宾还有独立学者柳红。在上山后的当天晚上,柳红就和自己的丈夫朱嘉明打了一通电话。1984年,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的朱嘉明是莫干山会议的4位发起人之一。在电话里,朱嘉明告诉柳红,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最让他珍重的是在历史关头,大家那种超越了观念分歧的“真情实意”。在有些时候,这种精神似乎获得了某种延续。5天会议期间,一位来自清华的博士在回北京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教师发言后,又连夜赶回莫干山参会,并坚持到最后一夜;另一位来自浙江大学的教授则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回到杭州为学生们上课,然后再赶回莫干山。但在另一些时刻,表现得更加强烈的则是一种断裂感。尽管筹委会很早就定下了“以文选人”的原则,但最终提交的论文总数仅有100余篇,这与1984年的1300多篇有天壤之别;筹委会还下一个酒吧,可供学者们晚上进行“挂牌讨论”使用,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觥筹交错是这间小木屋里的主题。连被吸引而来的媒体数量也十分有限,一位记者坦率地评论道:“相比于博鳌论坛与达沃斯论坛,谁还会来莫干山呢?”对于莫干山会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教授常修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体悟。他至今保留着已经发黄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材料,在今年8月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史纲》中,他所撰写的“莫干山会议”被列为单独一章。他说,自己怀念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革年代。到达莫干山后的第二天,他就叫上王小鲁,沿着盘山道寻找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历史印迹。在半山腰的榭窗里,他们找到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合影,在照片里,183位年轻的与会者穿着白色的衬衫,因为天凉,还有几个人将炊事员的白制服捧在手里。在那个长达7天的会期里,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开。他们还找到了当年拍集体照的地方,两棵古树仍在,只是拍照的空地已经变成了停车场。第二天,在莫干山管理局王惠良的帮助下,常修泽找到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主会场——一座有着拱形门檐的蓝顶教堂。只是,就像中了魔法的城堡,矗立在山顶的教堂已经成了装满废旧家具的仓库,木门倒在地上,台阶上满是荒草。

新闻眼

秦臻子
他人的尊严
我就是那种喜爱拉长脖子“围观”的人。这世上有人戴表,有人砸车,有人当街学掴别人,处处看不完的奇景。就在前两天,我远远听见了热烈的掌声,便立即“飞奔”过去。那是献给一群聋哑人的掌声,长春市聋协庆祝第55届国际聋人节的活动正在长春大学鼓锣锣鼓地进行着。起初我还为一群姑娘的舞姿吸引,她们都是特教学院听力障碍的学生。我站在台下啦啦叫好,为她们追求梦与美的权利和能力。随即我便沉默了。16位老人走上舞台,演唱了一首《东方红》。你可能很疑惑,聋哑人怎么唱歌?我的确见过很多令我感动的残障人士表演,可在这条新闻里,我很怀疑,由台下的掌声、媒体的报道、路人的叹息所组成的人文关怀,是否能给他们足够的尊严。设身处地想想,也许相比于这样吃力的歌唱,心灵的陪伴、生活的便利、真正平等的交流,这些,才是他们更需要、更有尊严的生活。

天赋的尊严

我是真的被那三幅公益广告打动了。在最平常不过的家庭场景中,餐桌、床铺和浴缸被拉得很长,一头是吃晚餐的爸爸、读故事的妈妈和健康的妹妹,一头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自闭症儿童越不及时得到帮助,越难以接触。”在看起来无限远的一方,孩子显得那么孤独。似乎已经看不清他可爱的面颊,更听不到他心里的声音。直到我看到芝芝的画,这个12岁小女孩被网友称作“小毕加索”。为了展示她的天赋,让她继续接受美术教育和治疗,芝芝妈妈在微博上卖女儿的画作。作为门外汉,我只能听画家的评价:“非常惊讶。”虽然有些原创画我并不能完全看懂,但我至少获得了一面镜子,映照她丰富的内心世界。那里是现代医学还未能尽览的领域,但画笔描摹出的一切足以为她赢得尊严。她同时赢得的,还有一项公益基金计划的关注。该基金刚刚将芝芝作为首位受助者,购买了她的近百幅画作,还在北京为她举办个人画展。与此同时,另一项公益计划也在进行中。从10月中旬开始,一组自闭症儿童的美术作品将在天津展出。在此前19名家长联名拒绝自闭症孩子入学后,有医学专家发表观点,一部分自闭症患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智商”相反,他们具有非常高的智商。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就真的没有风景吗?也许,只是因为你手中的光还不够明亮。

脆弱的尊严

如果小霞没有死,她很快就要参加中考了。或许初恋已经在不远处静候她的到来,或许大学校园也是她梦想的地方。但她选择终止自己的生命旅程,也就选择了一切可能性的丧失。“海燕,我确实没拿你的钱,如果你不相信,我只有先走一步。再见。”当被朋友怀疑偷了253元钱时,15岁的小霞留下遗书,饮农药“自证清白”。我想起15岁时的自己,耳朵塞着流行音乐,手里翻着言情小说。在我的世界里,尊严只是用成绩守住的年级名次。而对于小霞来说,尊严大抵是需要用生命换取的终极价值。只是这份尊严太薄、太脆,太不值得为之伤害自己。生命教育的缺失是一方面,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监护不到位是另一方面。而这个发生在甘肃陇南的悲伤故事背后是一个更令人悲伤的现实:根据公安部的一项调查,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案件大多数发生在农村,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早在两年前,湖北孝感一少女就曾因被偷钱而自杀。如今,“悲剧复印机”又一次启动了。谁来拉住我们的孩子,守护他们脆弱的心灵?